

# 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批判理论笔谈

(主持人:张亮)

**编者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地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作为新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提上日程,充分显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如何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问题,已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我们认为,一方面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出发;另一方面必须要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优秀文化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基于此,本刊集中编发了这组文章,全面分析了马克思、西方马克思主义、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客观评价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贡献和不足之处。我们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引起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广泛关注,以期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及其当代评价

张亮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下的一个次级概念,“文化唯物主义”用以定义威廉斯、汤普森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所开创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传统。它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思索的思想结晶,为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文化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英国新左派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2)04-0001-05

20世纪80年代,深刻的社会转型引发了20世纪历史上中国社会的第二次“文化热”。受此热潮推动,9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引进、译介了不少国外的文化学说、文化理论和文化哲学。“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就是其中原本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种。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学术潮流的兴替,人们逐渐发现,“英国马克思主义”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贡献之一就在于突破了对文化的狭隘理解,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大众文化

理论,从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理论做出了推进<sup>[1]</sup>。因此,进入新世纪以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日益得到学界的关注。然而,我们注意到,由于当前致力于本领域研究的学者学科背景不同,研究旨趣也不同,加之相互间缺乏充分的学术对话与交流,结果导致学者们在核心概念的定义和使用上各自为战。这种混乱局面的持续存在已经影响到了学者们对“文化唯物主义”的历史发生、理论命意及其理论价值的理解和评价。

收稿日期:2012-08-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ZX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10JJD710011)

作者简介:张亮(1973—),男,江苏徐州人,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学”等领域的研究。

## 一、“文化唯物主义”的概念考证和再定义

20世纪90年代前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首先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被引入国内。之后,随着译介工作的不断推进以及自主研究的逐渐展开,它的理论形象也随之变得丰富和饱满,最终突破文学理论的界限,先后进入文化研究、传播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阈。由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不同、研究旨趣各异,所以,选择使用的核心概念也就不尽相同。于是,在本领域研究中就出现了“文化唯物主义”、“文化主义”与“文化马克思主义”这3个概念各行其道的局面。

在当代英国语境中,“文化唯物主义”概念毫无疑问是与雷蒙·威廉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威廉斯用一种相对系统化的形式阐述了“我多年前就已经达及的”一种理论“立场”,并明确指出,“这是一种可以简单地描述为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即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关涉物质文化生产与文学生产的特殊性的理论”<sup>[2]</sup>。对于威廉斯的这一表述,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以一种非语境化的方式对待之,基本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即威廉斯为什么会时隔多年才系统阐述并命名自己由来已久的理论?要解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英国新左派的历史中去。我们知道,在《识字的用途》、《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著作中,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爱德华·汤普森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创造出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传统,并在新左派内部得到了广泛认同。然而,随着第二代新左派的崛起,在思想上越来越强烈地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当代欧陆思潮影响的第二代新左派日益疏离第一代新左派开创的传统,进而基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立场,对后者进行了全面而尖锐的批判,从而引发了第一代新左派的反批判浪潮<sup>[3]</sup>。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就是在这种思想史语境中被创作出来的。当威廉斯把自己“多年前就已经达及的”理论“立场”命名为“文化唯物主义”时,说到底,是为了回应伊格尔顿对自己的攻击<sup>[4]</sup>,申明自己从来都是“唯物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对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概念,我们有必要追问:作为批判的发动者,第二代新左派如何看待“文化唯物主义”概念?既然威廉斯的文化理论是第一代新左派创立的那种新的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文化唯物主义”概念是否

也可以指称那个新的传统呢?

面对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新概念,斯图亚特·霍尔领导下的伯明翰学派迅速做出了回应。他们先是戏谑性地仿造出了一个“文化主义”概念,继而由霍尔在1980年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论<sup>[5]</sup>。在霍尔等人看来,第一,文化主义是一种具有英国本土特色的理论传统;第二,这种传统是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共享的;第三,文化主义曾对伯明翰学派早期的文化研究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此而言,后者也应当属于文化主义传统之列;第四,在与结构主义的对比中,文化主义深刻暴露出了自己的诸多内在局限性。由此可见,霍尔等人之所以要用“文化主义”来戏仿“文化唯物主义”,原因就在于他们还是质疑“文化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但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对我们的第二个追问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即:从思想史的角度讲,“文化主义”(“文化唯物主义”)指的是第一代新左派集体开创、部分第二代新左派曾一度直接参与其中的新的文化理论传统。

面对“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主义”这两个看似相近实则相互对峙的新概念,英语世界那些最早的研究者们自觉不自觉地做出了选择。一般说来,倾向于支持威廉斯立场的研究者大多愿意使用“文化唯物主义”概念,同时对整个第一代新左派也都保持一种亲近或者同情的态度。而使用“文化主义”概念的研究者则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新左派及其支持者,这一点在文化研究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很显然,这种修辞政治学延续并不断地强化了两代新左派之间的理论差异。那么,除了差异外,两代新左派是否有共享的东西呢?80年代中期,当美国文化史学者德沃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开始涉及这一领域时,他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潜心研究,他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因此,当他决定系统呈现自己的研究成果时,既没有使用“文化唯物主义”,也没有使用“文化主义”,而是新定义了一个“文化马克思主义”概念,以期把两代新左派呈现为一种“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终结于70年代晚期,或者说起于福利国家的形成终于撒切尔政府对福利国家的改造”、“非教条的、批判的”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发展阶段<sup>[6]</sup>。

通过上述概念考证,我们不难看出,“文化唯物主义”、“文化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这3个概念都具有明确的出处和确切的原初定义域。不过,

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文化马克思主义”概念显然更加可取;第一,作为客观的思想史反思的成果,它能够超越“文化唯物主义”和“文化主义”所隐含着的思想冲突与斗争;第二,它以历史主义的方式处理了两代新左派在文化理论方面的异与同,具有更大的思想史包容力;第三,它在一个更加完整的思想史图景上准确地把自己定位为“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更强的思想史解释力。当然,“文化马克思主义”概念也不完美,明显的问题就在于它未能对两代新左派各具特色的文化理论进行恰当的区分、命名。有鉴于此,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个人倾向于把“文化唯物主义”作为“文化马克思主义”下的一个次级概念来使用,并把它的定义域从威廉斯本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扩大到以威廉斯和汤普森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左派集体开创、部分第二代新左派曾一度直接参与其中的那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传统。

## 二、“文化唯物主义”的由来

“文化唯物主义”的起源应当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那时候,英国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党员开始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具体的英国问题,并形成了若干有创见的理论成果,从而开创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英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优良风气<sup>[7]</sup>。“二战”结束后,左派知识分子沿着战前开辟的道路继续致力于英国本土问题的研究,并于1956年新左派运动兴起之后,在历史学和文学理论这两个马克思主义传统最为强大的领域率先实现重大突破,从而创立特色鲜明的“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sup>[8]</sup>。当时,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正致力于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解决英国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早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们也深深地被无产阶级文化和新兴大众文化所感染,正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利维斯主义,以实现利维斯所崇尚和接续的“文化与社会”传统的革命化恢复。因此,双方殊途同归地会师于文化领域,从而使“文化唯物主义”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方面率先呈现在世人眼前。

在“文化唯物主义”破冰而出的过程中,霍加特1957年出版的《识字的用途》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尽管是很小的一步。该书是一个筹划了很长时间的创作计划,因此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它力图摆脱的过去的传统的很多印记,在方法上和理论上都不够彻底,具有不少显而易见的缺陷,从而影响了后人对它

的理解和评价<sup>[9]</sup>。不过,就“文化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而言,它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应当被遗忘的:首先,它开创性地探讨了工人阶级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从而推动了英国新左派的“文化转向”<sup>[10]</sup>;其次,它在文化分析中坚定地反对任何还原论倾向,从而提示正在努力摆脱斯大林主义思想束缚的英国新左派,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最后,它的文化观念的含混性及其方法革新的不彻底性,为新左派标示出了继续前进的大方向。

面对《识字的用途》遗留的问题,威廉斯、汤普森等其他新左派迅速做出了回应。

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斯大林主义在英国左派理论界曾长期占据支配地位。在二战后的理论探索过程,后来成为新左派的那些左派知识分子们与斯大林主义的差异、对立日益加深。新左派运动的兴起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系统地批判斯大林主义,全面阐发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在这个方面,汤普森195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一文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斯大林主义为什么会把历史唯物主义扭曲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在汤普森看来,除了“思想庸俗化”这个原因外,深层的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主义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质,不是从人出发,并在人的实践过程中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所以,它只看到了人的被动的反映能力,而没有看到,“最重要的是,人并非仅仅被动‘反映’经历,他们也思考经历,他们的思索对其行为产生影响。思考是人类创造性的一面,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它也会让人类部分地成为历史主体,正如他部分地成为其环境的牺牲者一样。”既然在这个根本点上一开始就发生偏差了,那么,斯大林主义接下来发生其他一系列具体的偏差或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在汤普森等新左派眼中,斯大林主义最致命的一个具体的错误是未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是一种便宜说教的、虚构的“模型”:“作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矗立其上并对其产生反作用的由各种思想、制度等组成的‘上层建筑’。事实上,这种‘基础’和‘上层建筑’从未存在过,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实际存在的事物——行动、经历、思考、再行动的人——的隐喻。”<sup>[11]</sup>之所以斯大林主义不可能正确理解文化、道德等上层建筑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直接的理论原因就在此。

以上述反思为基础,在1958—1963年的系列论著中,威廉斯和汤普森最终建构出了一种全新的文

化概念。首先,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沿着霍加特开辟的道路不断向前,强调文化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并据此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化概念:“从根本上说文化还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sup>[12]</sup>接着,在“文化是日常的”一文中,他对自己的这一文化概念进行了正面阐述:“文化是日常的,那是首要的事实……我们看到,文化的本质既是传统的也是创造的,它既是最日常的共同意义也是最精细的个别意义。我们在这两层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一方面它意味着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共同意义,另一方面意味着艺术和学问——特定的发现过程和创造性成果的诞生过程。一些写作者往往对此各执一端,我则认为不可偏废,它们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我们的文化,我所问的关于我们的共同而普遍的目的问题,也是关于深层个人意义的问题。文化是日常的,就在每一个社会和每一个头脑中。”<sup>[13]</sup>而在1961年正面阐述其文化观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威廉斯对自己的文化概念做了如下更清楚的解释:“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其次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表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从这种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阐述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或隐而显的意义和价值。”<sup>[14]</sup>对于威廉斯的这个新定义,汤普森肯定它“澄清了问题并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但认为应当沿着这一方向更进一步地来界定文化概念:“如果我们把威廉斯定义中的‘生活方式’换为‘发展方式’,那么,我们就从一个容易产生消极冷淡联想的定义转换到了一个能够提出活动性和主体问题的定义。如果我们再把词动一动,把隐含在‘发展’中的‘进步’联想删掉,那么,我们就得到‘整体冲突方式各要素间的关系研究’。冲突的方式也就是斗争的方式。”<sup>[15]</sup>

与全新的文化概念相伴而生的,就是那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范式<sup>[16]</sup>。这种在探索解决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研究范式有三个支撑点,即“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人民历史”观念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议程;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可以实现对真实的经验整体的倾听和再创造、对以往被忽略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与评价;它隐含着的政治结论则是坚信英国工人阶级

不仅具有革命传统,而且可以通过适当的引导重新焕发出自己的革命精神,从而推动英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就像亲第二代新左派的文化研究者斯图雷雷指出的那样,在斯图亚特·霍尔与人合作的《通俗艺术》以及伯明翰学派60年代的其他早期成果中,“文化唯物主义”(文化主义)范式也都得到了自觉的贯彻落实<sup>[17]</sup>。

###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文化唯物主义”

如前所述,“文化唯物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被引入国内,继而才逐渐进入文化研究、传播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阈。这在客观上导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不够充分,理解和评价也不够到位。不少学者干脆就觉得它是非哲学的,没必要进行哲学研究与评价。事实上,说到底,“文化唯物主义”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反对斯大林主义,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思索的思想结晶,是在特定理论语境中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相当成功的本土化尝试。就此而言,对“文化唯物主义”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评价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

首先,“文化唯物主义”把握并恢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从而捍卫与扩大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英语世界的理论声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都不是专业哲学家,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理论努力,把握到了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地位,继而在此基础上对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尽管他们的反思与批判也存在某些不足甚至危险的错误倾向,但必须看到的是,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历史唯物主义才摆脱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的消极影响,恢复了自身应有的理论声誉。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文化唯物主义”的首倡之功,历史唯物主义不可能在英语世界获得今天这样蓬勃的传播与发展。

其次,“文化唯物主义”坚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事具体的经验研究,从而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后来的理论发展确定了最基本的理论创新道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相比,“英国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它主要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化,而是通过分布于具体学科中的学术研究,完成自己的理论创新的。这种独特的创新道路就是由第一代新左派

通过“文化唯物主义”确定下来的。第一代新左派之所以会确定这种道路,除了英国固有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外,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深刻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因此,它只有指导具体的经验研究并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理论威力,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提供科学的认识。就此而言,“文化唯物主义”所确定的道路就是马克思所倡导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sup>[18]</sup>。

再次,“文化唯物主义”推动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思考,从而促进了某些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发展。具体地说,第一,“文化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说抵制、批判了经济决定论、经济还原论倾向,从而使得人们对两者关系的理解日趋全面和辩证;第二,“文化唯物主义”突破精英主义的狭隘理解,在实践概念的基础上重新定义文化概念,从而使过去被遗忘、被忽视甚至被蔑视的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得以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进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的形态和社会功能的理解;第三,“文化唯物主义”证明阶级不仅是经济的形成,也是“社会与文化的形成,其产生的过程只有当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自我形成时才能考察,若非如此看待阶级,就不可能理解阶级”<sup>[19]</sup>,进而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形成理论、阶级意识理论以及阶级斗争分析方法等的诸多误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第四,“文化唯物主义”具体地、充分地展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使人民史观获得了生动的证明。

最后,必须看到的是,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最早形成的一项理论成果,“文化唯物主义”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颇、局限性甚至是危险的倾向。具体地说,第一,在反对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文化唯物主义”矫枉过正,存在着不自觉地否定经济基础的客观存在以及物质生产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倾向;第二,“文化唯物主义”过分突出文化的中心地位,对经济、政治领域的冲突与斗争关注不足,并且对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与革命潜能给出了过于理想化、过于积极乐观的评价;第三,理论实践表明,“文化唯物主义”能够很好地解决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工人阶级及其文化问题,但却不能胜任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文化问题的批判分析,究其缘由,关键就在于它对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及其社会功能缺乏完整准确的理解。

## 参考文献:

- [1] 张亮.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道路和理论成就[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7):123-131.
- [2] WILLIAMS R. *Marxism and litera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5.
- [3] 张亮. 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J]. 文史哲, 2010(1):129-136.
- [4] EAGLETON T. *Criticism and Ideology* [M]. London: New Left Book, 1976:24.
- [5] HALL S.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980(2):52-72.
- [6] DWORKIN D.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 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 of cultural studies* [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1.
- [7] 张亮. 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兴起[J]. 国外理论动态, 2006(7):40-45.
- [8] 张亮. 从苏联马克思主义走向文化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战后形成[J]. 人文杂志, 2009(2):1-7.
- [9] 王晓曼. 作为文化研究真正开端的《识字的用途》[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94-99.
- [10] 斯图亚特·霍尔, 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及文化转向[M]//张亮. 英国新左派思想家.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37-52.
- [11] THOMPSON E. *Socialist humanism: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 [J]. *The New Reasoner*, 1957(1):111-113.
- [12] 雷德·威廉斯. 文化与社会:1780-1950 [M]. 高晓玲, 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337.
- [13] WILLIAMS R. *Culture is ordinary* [M] //HIGGINS J.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11.
- [14] WILLIAMS R. *The long revolution* [M]. London: Harper Torchbooks, 1966:41.
- [15] THOMPSON E. *The long revolution I* [J]. *New Left Review*, 1961(6):33.
- [16] 张亮. 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125-129.
- [17] STOREY J.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Pearson Longman, 2009:51-58.
- [18] 张亮. “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开辟的道路[J]. 江海学刊, 2009(2):34-38.
- [19] 爱德华·汤普森.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 钱乘旦,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4.